

watch| 上证观察家

金融资源效用最大化该从何处入手

总体上看,中国经济与金融运行都呈现出明显的非均衡特征。一方面是金融体系中的流动性过剩,另一方面是农村、中小企业等经济领域仍难以获得足够的金融支持;而在城乡、地区、企业之间,金融资源配置也体现出种种结构性失衡。一种有益的思路,是从促进金融资源的供求均衡着手,探索实现金融资源使用效率最大化的路径与原则。从金融资源供给来看,应该同时加强间接金融资源与直接金融资源的有效供给。

□杨涛

金融是现代经济中最具魅力而又变幻莫测的领域,某种程度上已成为人类社会的存续基础。进入2007年,金融创新产品的推出、外资银行的进入、农村金融的放开等重大事件,使金融问题成为最吸引眼球的话题之一,而中央政府也把金融改革重要性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。毋庸置疑,在二十多年的市场化进程中,中国金融发展之路是迅速而杂乱的,亟待改革之处也是千头万绪。一种有益的思路,是从促进金融资源的供求均衡着手,探索实现金融资源使用效率最大化的路径与原则。

总体上看,中国经济与金融运行都呈现出明显的非均衡特征。例如,一方面是金融体系中的流动性过剩,另一方面是农村、中小企业等经济领域仍难以获得足够的金融支持,这表明资金金融通机制确实存在问题。而在城乡、地区、企业之间,金融资源配置也体现出种种结构性失衡。从金融资源的需求来看,这种失衡主要包括三方面。

不正视问题 比高房价本身更危险

□魏也

“有些领导,住的房子都已经200多平方米了,还在说买不起房,这是睁着眼睛说瞎话”;“房价那么高是媒体炒来炒去炒出来的”;“为什么你们总说广州的房价高?广州的房价比深圳、上海都低”……3月11日上午,贵州省省长、原广州市委书记林树森在接受广州媒体的集体采访时,讲了上面的话。

如果真如林树森所说,房价并不高,那么,中央为何接连两次出台房市调控政策?如果房价是媒体炒作起来的,那么,是不是调控政策直接对准媒体就可以了?如果说领导都能买得起房,依照目前的房价和领导现有的工资,可信度有多高?

不正视问题比问题本身更可怕。两会期间,全国政协委员、广州市政协原主席陈开枝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:“现在广州房子均价每平方米8000元,我都买不起!”而在此之前,广州市政协委员、天河区副区长丁建华也声称“自己就是无房一族”,“房价涨得不可开交,很多公职人员,凭正常收入是很难供得起房的。”那么,林树森斥领导买不起房的理由,是否包含了公职人员的非正常收入呢?假如没有丁建华副区长所说的非正常收入,官员都能买得起房就真的令人奇怪了。

媒体本事再大,也不能把房子炒上去或炒下来,这是一个最基本的经济学常识。当很多领导干部凭借正常收入也买不起房的时候,房价就不仅仅是高的问题,而是太高的问题!倘若忽视这一点,住房这一民生问题就可能恶化。令人费解的是,林树森明确表示:目前,政府是管不了商品房价格的,现在的商品房是“随行就市”,能卖多少就是多少,不可能依靠人就让它便宜下来,所以要“赶快买”。

这跟前几天广州市市长张广宁的语词形成了鲜明对比。3月5日,全国人大代表、广州市市长张广宁面对大批媒体表示:“按照中央的要求,广州市政府会全力以赴地把这个房价压下来”,他劝“中低收入”的市民不要着急(买房)。“其中显现出政府关心民生疾苦,坚决调控房价的决心。刚刚几天的时间,林树森突然给出一种截然相反的判断,让“赶快买”,那么,老百姓该听谁的?张广宁说的把房价“压下来”是“按照中央的要求”,那么,林树森的“赶快买”又是基于什么作出的判断呢?房市调控之所以未能达到预期目的,关键在于,一些地方政府官员和开发商由于有相同的利益取向,对中央调控政策阳奉阴违。当温总理把住房问题视为“最觉得痛心的问题”时,竟有地方政府官员认为房价不算高,要“赶快买”,委实令人费解。

其一是对居民的金融资源供给失衡。我们常常羡慕美国人的富裕,因为美国人能获得空前丰富的金融产品,以此在时间和空间上最大化自己的福利。对于现代市场经济国家来说,社会福利的不断提高是目的,金融资源对居民的可得性是重要手段。而在我国金融体系中,居民可获得的金融资源有限,表现在可用于个人投资、理财、经济便利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极其匮乏。此外,政府金融政策对居民的重视也有所不足,如在股市改革、亟待改革之处也是千头万绪。一种有益的思路,是从促进金融资源的供求均衡着手,探索实现金融资源使用效率最大化的路径与原则。

其二是对企业的金融资源供给失衡。首先从整体上讲,企业生产还缺乏稳定的长期信用供给。在工业化中后期,规模经济和产业升级都使企业往往需要大规模长期投资,在我国资本市场尚不发达的情况下,还是主要依靠“短存长贷”的商业银行信贷资金来满足。对此,有两方面问题不容忽

视。一方面是需要有专门的长期信用银行,为长期投资提供稳定的金融支持。这种长期信用银行往往有政策性特征,受到特殊政府支持,如开发性银行、住宅储蓄银行等。我们知道,当前的政策性银行改革是以商业化转型为主线,在此必须注意避免政策走极端,因为保留和发展一套政策性金融体系是有必要的。另一方面,从公司债券开始发展企业融资产品,也在一定程度上带来经济秩序混乱和金融风险积累。应该说,这种金融失衡不仅会影响当前经济稳定,而且会通过影响城市化进程而产生深远的负面后果。我们坚持认为,尽快赋予地方政府以发债权,使地方隐性负债得以显性化,总是利大于弊。此外,应针对城市化需求,发展多样化的城市投融资产品,包括正确看待打包贷款在内的结构金融产品。

从金融资源供给来看,应该同时加强间接金融资源与直接金融资源的有效供给。

一、促进信贷资金配置的优化,需要多方面配套改革。除了制度和政策因素,从技术的角度看,有必要在规范和调控信贷二级市场的同时,尽快发展和完善

信贷二级市场。在发达国家,信贷资产转让非常普遍,已成为银行资产管理和风险控制的重要手段,客观上使信贷资源在高速流动中获得更好的配置效率。我国自2002年开始批准银行同业信贷资产交易,目前信托、财务公司等也逐渐介入,但总体上交易规模有限,资产质量不高,很多交易仅仅是基于规避监管的目标。从长远来看,逐步建立起规范的全国性信贷资产二级市场,无论对银行改革还是间接金融结构优化来说都是有益的。

二、增加直接金融资源的有效供给,除了继续发展传统的股票、债券市场之外,加快各类金融衍生品创新也是必要的。我们要强调的是,金融创新应同时关注体制内和体制外创新。首先,当前国内金融创新的一个典型特点是政府主导,在金融机构自主创新能力普遍不足、金融市场尚不完善的情况下,这种政府主导创新体现出成本低、效率高的特征,在一定时期内具有合理性。这种政府主导创新通常集中在银行业市场,因为该市场包括了银行、保险等最大的资金主体,同时又吸纳证券公司、投资基金、财务公司等众多法人企业。除此之外,政府还给予与体制外的民间金融创新以更大空间,因为民间自主创新毕竟是金融自由化的源泉,如私募基金、合作建房融资等理应获得更多宽容。(作者系中国社科院金融所货币理论与政策研究室副主任,副研究员)

民族复兴需要教育投入打基础

□王杰

与生产性投入相比,在教育等方面的投入所形成的人力资本,带来了更高的回报。200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赫克曼估计,中国投资人力资本的回报率可能高达30%至40%。这不仅是直接的经济收益,如果考虑到教育对改善国民素质、增强社会凝聚力和凝聚力的作用,回报将更为可观。

因此,任何一个大国的崛起都需要有足够的教育投入作为支撑。以日本为例,日本政府1972年颁布《学法令》时就明确提出要做到“邑无不学之户,家无不学之人”。资料显示,日本在1910年就已经达到边远乡村教育普及的水平,当时的工厂企业管理人员中拥有本科学历的就已经达到47%。对教育的高度重视推动了日本的崛起。日本前文部大臣荒木万夫说:“从明治维新至今,我国社会和经济的发展,特别是战后经济的发展非常惊人,为世界所重视,造成此情况的重要原因,可归结为教育的普及和发展。”

教育投入占GDP的比重是衡量一国教育投入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,研究表明,当人均GDP达到800-1000美元时,公

共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下限为4.07%-4.25%。因此,1993年颁布的《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》中明确规定,逐步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,到20世纪末达到4%,但这个目标直到现在还没有实现。

大国崛起是在竞争中崛起的,而取得竞争优势的惟一捷径就是提升国民的素质,培养大量人才。因此,世界各国都非常重视教育投入。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,世界各国教育投入占GDP的比重平均水平就达到了5.2%,发达国家是5.5%,发展中国家是4.5%。而我国从1994年至今,绝大部分年份的教育投入占GDP的比例都低于3%。2005年,我国用于教育的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约为2.82%。目前我国的人均GDP已经超过1000美元,4%的目标理应以实现。

相关研究成果表明,目前,发展中国家政府在这些基础设施上的投入比重已经过高,从长远来看,这可能抑制经济的可持续发展,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加大教育投入。

今年两会上,财政部部长金人庆就财政工作回答中外记者提问时表示,我国用于教育的财政支出,估计今年有望超过3%。

供电合同 不能忽略电力企业垄断因素

□予人

据报道,与居民用电关系密切的《居民供用电合同》(征求意见稿)近日已经出台并且征求意见完毕,有望在今年出台。此举标志着多年来居民用电无合同、只交电费不能索赔的历史将告结束。

供电、用电双方长年不签订任何合同,不通过合同确立契约关系,这种现象在契约约为基本元素的西方社会是难以想象的。不仅供电,像供水、天然气等等,也存在着这种现象。由于合同缺失,处于垄断地位的企业经常通过各种手段侵害消费者权益,即使明知权益被侵害,消费者也常常无法提起诉讼。

此前电监会对全国供电企业的供电服务进行检查,结果显示:部分供电企业在电价收费上不规范,把保险费等其他名目费

用加收在电费上;一些供电企业甚至自行下文对城镇用户每户每月加收1度电费,安装照明灯、煤气表等用电设施。这些延伸费用缺乏收费依据,违反了国家相关规定。供电企业处于自然垄断状态,与用电居民相比是绝对的强势者,倘若没有合同的制约,供电企业通过侵害居民权益牟取私利的冲动就会变得非常强烈。《法制日报》曾披露,1998年和1999年两年,电力行业就违法收取27.4亿元。

因此,需要通过合同,使供电企业和用电居民形成法律框架下的契约关系,任何一方都可以依法维权。《居民供用电合同》(征求意见稿)的出台,积极意义正在于此。合同强调的是一种平等的关系,一方当事人(在目前的状态下,这里更多的是指垄断者)不得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另一方当事人,一旦平等的契约关系通过合



漫画:刘道伟

从今年新学年开始将大幅度加大助学金、奖学金的投入力度,完善国家助学贷款政策。财政部和教育部正就此进行制度设计。金人庆说,估计到2010年,我国用于义务教育的开支将达3000亿元。金人庆说,中国公共财政,非常愿意为教育“买单”。但是,金人庆部长没有回答4%的目标何时实现这一问题。这说明,在财政分配过程中的博弈,依然会比较激烈。

财政性教育投入不足,影响教育的发展是必然的。以教师工资拖欠问题为例,早在2005年“两会”期间,全国政协委员沈

士团指出,仅2004年1月至9月,全国新欠中小学教师工资就有10亿元之多,累计欠发教职工工资高达163亿元。教育投入不足留下的巨大缺口,导致一些地方的教师流失现象严重,势必会影响到教学质量,影响到国民素质的提升。

综观世界各个发达国家,他们在崛起的过程中,教育都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。教育是大国崛起的基础,任何国家不能脱离教育而崛起。因此,我们对教育的投入应该继续加大,最起码,上世纪定下来的4%的目标应该尽快实现。

■话说两会

不要怪吴敬琏“无情”

□诸葛立早

在今年“两会”上,吴敬琏这位以慈祥敦厚著称的大经济学家,对一些财经记者的提问,给了颇为“无情”的回答——尽管他还是袒露着那熟悉的“吴氏微笑”。

“无情”之厉,在于“反问”。比如,有记者问吴老,“您说过中国股市是Casino(赌场)……”,话未说完,吴敬琏即打断:我已经纠正过了,当时说的并非“中国股市是Casino”,而是“当年股市是没有规范的赌场”。这位记者不甘心地继续追问:那“赌场说”和沪深股市最近大幅波动有什么关系,会不会崩盘?吴敬琏的回答更加干脆,2001年的说法,和最近股市会不会崩盘有什么关系?

还比如,另一记者问,“您对现在物价高低怎么看?”吴敬琏笑答:现在通货膨胀率偏高,但什么叫物价高、物价低我就不太懂。他反问记者,“一石谷和一斤米哪个物价高?”吴老的意思,显然记者用词不太准确。

再比如,又有记者问及社保问题:“行政管理机关和社保基金管理机构合二为一,这是体制上的一个漏洞吗?”吴敬琏再次“挑剔”:“十四届三中全会就已经明确规定了,社保基金的行政管理和基金运营要分开,我不知道你是国内记者还是国外记者。如果你是国内的记者,应该知道十四届三中全会有这个决定的”。

这些“花边新闻”,我是在中国新闻网上看到的。我颇为仔细地查看了“两会”期间所有有关吴敬琏的新闻,发现见诸报端的,几乎没有把吴老这些严厉的“挑剔”,原汁原味地披露出来;有的是意思有了,但来龙去脉不甚清楚,看来“只讲‘过五关斩六将’,不讲‘走麦城’”,时下已经“后继有人”。作为一个吃了十几年财经报纸“饭”的记者,看了这些被人称之为“无厘头”的提问,有一种如芒刺背的感觉。虽然时下网上有功吴敬琏“批特点”的说法,我却仍然认为,吴老的脑瓜“精得很”,他打的是我们不少财经记者的“软肋”。

此“软肋”,亦即是我们一些财经记者对财经专业的不精。新闻有“学”,现在已经是无可争论的问

voice| 上证名记者

“区域经济”能否跑赢“利益博弈”

□倪小林

最近,河北省的省长感叹“京津冀协调难在产业分工”,对区域经济的进展中遇到的“拦路虎”——行政规划经济影响要素流动,这位省长为此发出急切的呼吁:要发展区域经济必须建立有效的协调机制。“协调机制”不得已成了京津冀区域经济的先决条件。这倒不是说地方政府对于区域经济不积极,而是当本位利益与区域利益博弈时,区域经济往往会服从地方经济,导致区域经济发展缓慢甚至难以向前推进。

事情难在已经形成的经济格局和利益格局,依然制约着区域经济的进展。一两年前人们担心发展区域经济的力量去完善:一是省级之间的断崖高速公路,那些省级之间三不管地区的贫困和经济发展问题,都因为地方利益问题变得十分复杂。

谁来打破行政区划,让经济要素在区域内按市场原则流动起来,真正起到区域经济圈中省市之间、市与市之间优势互补作用,我们无法回避,也不可能回避得了。

目前经济界人士对于解决区域经济发展中的问题,提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思路,一是完全放开市场让经济要素按照市场规律流动,二是发展区域经济的中央政府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,因为靠市场调解有两个重要因素不可忽视:法律法规健全和成熟的市场。

按照市场化的原则发展区域经济在经济界没有歧义,只是有的专家认为发展的阶段性目标,必须综合考虑国情。目前在以上条件都不能满足的情况下,他们认为中央政府应当承担更多发展区域经济的协调职能,同时更应对于发展区域立法,以打破我国长期按照行政区划规划经济形成的格局。否则,区域经济发展永远跑不赢各地方之间的利益博弈,难以实现预期目标。

题了。财经新闻之有“学”,更应该是在题中应有之义。财经新闻跨境还涉财经与新闻两域。正是如此,财经媒体(包括财经版面)对财经新闻的从业人员提出了“两栖人”的要求。一方面,它以专业细化的路径采集财经资讯;另一方面,它以“外行看得懂,内行看得清”的手段传播财经资讯。有识之士言,目前财经媒体的发展已不是版面扩张的外延型发展战略,而是以专业细化为手段的资讯增强战略,这是很有见解的。记者的专业化水平决定相关媒体的分工水平和传播效率。提“无厘头”问题的记者,是决计担当不起此重任的,而当财经记者不能和专业财经人士在一个平台上对话时,被采访者的担忧,即生怕深陷责难性漩涡,进而产生群体性误读与错解,为情理之中。群此而论,吴敬琏的“挑剔”是一个警示:作为财经记者,要不断自问,积累是否到家,问题是否到位,理解是否准确。这是一道“门槛”。

不是危言耸听,这种“专业报纸不专业”的倾向,财经界人士已有诤言。巴曙松先生在“2·27”大跌后就感言,一个影响力日渐扩大的市场,一个参与者日益扩大的市场,需要专业、严谨的财经新闻的报道体系、报道团队。但是,从引发2月27日市场暴跌的一些导火索新闻看,典型地显现出娱乐化的、还是国外记者。如果你是国内的记者,应该知道十四届三中全会有这个决定的”。

这些“花边新闻”,我是在中国新闻网上看到的。我颇为仔细地查看了“两会”期间所有有关吴敬琏的新闻,发现见诸报端的,几乎没有把吴老这些严厉的“挑剔”,原汁原味地披露出来;有的是意思有了,但来龙去脉不甚清楚,看来“只讲‘过五关斩六将’,不讲‘走麦城’”,时下已经“后继有人”。作为一个吃了十几年财经报纸“饭”的记者,看了这些被人称之为“无厘头”的提问,有一种如芒刺背的感觉。虽然时下网上有功吴敬琏“批特点”的说法,我却仍然认为,吴老的脑瓜“精得很”,他打的是我们不少财经记者的“软肋”。

此“软肋”,亦即是我们一些财经记者对财经专业的不精。新闻有“学”,现在已经是无可争论的问

voice| 上证名记者

“区域经济”能否跑赢“利益博弈”

□倪小林

最近,河北省的省长感叹“京津冀协调难在产业分工”,对区域经济的进展中遇到的“拦路虎”——行政规划经济影响要素流动,这位省长为此发出急切的呼吁:要发展区域经济必须建立有效的协调机制。“协调机制”不得已成了京津冀区域经济的先决条件。这倒不是说地方政府对于区域经济不积极,而是当本位利益与区域利益博弈时,区域经济往往会服从地方经济,导致区域经济发展缓慢甚至难以向前推进。

事情难在已经形成的经济格局和利益格局,依然制约着区域经济的进展。一两年前人们担心发展区域经济的力量去完善:一是省级之间的断崖高速公路,那些省级之间三不管地区的贫困和经济发展问题,都因为地方利益问题变得十分复杂。

谁来打破行政区划,让经济要素在区域内按市场原则流动起来,真正起到区域经济圈中省市之间、市与市之间优势互补作用,我们无法回避,也不可能回避得了。

目前经济界人士对于解决区域经济发展中的问题,提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思路,一是完全放开市场让经济要素按照市场规律流动,二是发展区域经济的中央政府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,因为靠市场调解有两个重要因素不可忽视:法律法规健全和成熟的市场。

按照市场化的原则发展区域经济在经济界没有歧义,只是有的专家认为发展的阶段性目标,必须综合考虑国情。目前在以上条件都不能满足的情况下,他们认为中央政府应当承担更多发展区域经济的协调职能,同时更应对于发展区域立法,以打破我国长期按照行政区划规划经济形成的格局。否则,区域经济发展永远跑不赢各地方之间的利益博弈,难以实现预期目标。